

## 审视港澳 热盼统一

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今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议论版刊出该报编辑部作者麦路奇尔 (Melchior) 一文，标题是：“为什么北京要将香港转化为澳门。”该文的论点是，香港和澳门两地的历史背景、当前成就、社会制度和居民组成都不同，从北京的观点看来，澳门奉行“一国两制”充分正确，成效显著，而香港则是缺乏表现，所以将香港变为澳门就是北京的如意打算。

具体说来，港澳之别是如何呢？套用上文作者的话来说：“从澳门到香港乘轮渡一小时到达，但两地之差恍若两个世界。”澳门是赌城之最，市内霓虹灯耀闪，而黑道猖狂。澳门经葡萄牙统治四百四十二年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归还中国。葡萄牙直到一九七四年才建立比较稳定的民主政体。香港在英国百年的统治下更注重法治，给予居民更多的自由和服务，并建立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在一九六〇年代抗御了毛派势力的入侵，至今香港民主派的政治影响力也显而易见，对特首和立法局成员对全民普选也不断在争取中，澳门则既无此仇，亦无此法。

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发表了经济自由的统计指数。在资产权力方面香港得分93.3 (100是满分)，澳门得分60。香港在政府公正领域得分83.8，而澳门为33.2。全文的结论是，香港有注重法治的好名声而成为全球经济中心之一，澳门除了赌场著名外是乏善可陈。就此可知为什么香港人有香港人的作法。假如北京重视经济增长便要对他所求十分谨慎。(注：此指求将香港变为澳门。)

回顾往事，可知香港七个月以来动荡始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要建立“引渡条例”，以便处理港民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后逃回香港，躲避台湾司法的审讯和追究。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港民反对此举，附加了港民对北京积压的不信任和不满，引发了大暴动，步步升级，日日恶化，最后导致学生上街，警民互斗，共物破坏，商业萧条，……其恶果是使香港位居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 (仅居英国伦敦之后)，是全球旅客向往的去处，是外界和大陆业务中转站的种种大好地位和形象都大打折扣，每况愈下。如今香港乱局已大致收敛，但前景仍难预料。

于此让我们探讨一下“一国两制”的话题。一九八〇年代准备和完成香港回归，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为处理方案。香港于一九九八年回归中国，但“马照跑，舞照跳”，香港在回归五十年内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相对的，大陆则实行专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一国两制”到底。假以时日，要化为“一国一制”。十九世纪一八六一年美国爆发了解放黑奴为焦点的南北战争，林肯总统说：“国家不能一半是自由人，另一半是奴隶。”换言之，全国要供给全民一样的自由平等的制度和处境。

因而，给香港提供时间和空间去充分体验和改进其民主制度，是必要的，是有益的。同此，台湾也要大力朝民主制度的进步和成熟迈进。避开“台独”的虚招，最终走向中国和平统一的康庄大道。中国需要的不是“听话”的香港和“闭嘴”的台湾，而要切身检讨，如何改善本身的制度，最后发挥足够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让港民和台胞欣然接受欣欣向荣、自由平等的一国一制，共同造就民族重振的辉煌。

正所谓：“一国两制可过渡，全国一制是出路。努力走进港澳台，华夏一统高杆树。”

## 追思怀念黄华先生

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在新中国外交领域中一位杰出的人物是黄华先生，他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逝世，享年九十八岁。两年后，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北京举行了一个纪念会，我前往参会并即席发言，陈述了我对他的接触和敬仰。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中建交，邓小平副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访美，我应召加入了美国国务院接待中国到访嘉宾的礼宾工作。事前奔赴华盛顿首府接受培训，再介入接待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任务结束。

中国代表团此行访美九天，前后在华盛顿首府，美国卡特总统故乡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和德州达拉斯城参加多项活动，再于二月四日到达访美的最后一站西雅图。二月五日邓副总理在西雅图下榻的双塔宾馆里接见当地华侨代表二十余人，由我领队参加。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先生陪同邓副总理和侨胞们见面、合影并随后和大家交谈近半小时，他强调说：“华侨在国外谋生奋斗努力不息，首先要入乡随俗，对侨居的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再将余力报效祖国……”

在邓副总理接见华侨代表的现场，我口操川腔欢迎他抵达西雅图进行访问。他眼神一亮对我说：“你晓得会讲四川话？”我告以：“我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三台县长大的川娃娃，那时学会了四川话，至今不忘。”华侨们和邓副总理及黄华外长的合影我后来请黄外长转送邓氏签名，如愿以偿，珍存至今。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去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全国人大黄华副委员长，从上午九点畅谈至十一点二十分。以下是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我迎头便问他中国建国之初的情况如何。他说：“开国时犯的一个大错是没有加强重要干部的专业训练，但苏联早年做到了这点。再有，没有把大量抗日时期吸收的知识分子进行培训，加以重用。”

“中国当前要在基础建设方面努力进步，首先改进能源、通讯和交通设施。农村建设方面要注重分工、专业化，让有能力的人去做农村生产副业、施肥、灌溉等专业工作。”

我又请教国内推动“精神污染”的清扫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精神污染主要是针对生活放纵和散布色情的清理。在理论建设上有不同的意见是没有问题的。”至此我提及我于一九七九年结识正在《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的王若水，很佩服欣赏他的见地。

这时黄老很亲切的说，“我们来合影，坐近一点，把这匹马也照进去，好看一点。”很可惜后来我没有跟踪去取得这张照片。

谈到家常事务，黄老便说到：“我的外孙每天要送去日托，接送很辛苦。但北京缺乏全托，没有足够的师资、设备和地点去提供这种重要的服务，以后极需改进，因为一个小孩的父母都做事，要有

良好的全托设施去加以帮助。”“我有一儿两女，大女儿已成家，二儿子即将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准备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法律。小女儿在读中学。”

外交事务是黄老的本行，他兴致冲冲的说起：“一九五二年和五四年我两次去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看到其他国家的外长和代表的年纪都偏大，唯有我们是乌黑头发，朝气蓬勃，心里很高兴。只可惜我们没有好好把握，没有运用国民党和民主人士里的大量人才……马寅初提倡要控制人口的暴增，这番话大家不听，现在我们面临许多困难。如今中国人口若能少个两三亿就好多了。当前我们的农产品还能自给自足，很不容易了。”

至此黄老话锋一转地说及：“一个女干部她解放后下工厂，读大学，和厂里员工打成一片，成为很优秀的总工程师，厂长 (在东北某地)，是好的不断进修和很有成绩的榜样人物，她现已去世。听说她哥哥做过台湾装甲兵司令……”

最后谈及技术转让，黄老说：“美国提供核电设备和技术转让的条件是，美方要在使用现场督促中国，中国不同意。法国也可提供设备和技术，无此要求，便被中国接受……中国需要国外退休专业人员来中国服务，中国需要在技术、设备和人才三方面大量输入，不断增强，促进四化。就中国当前的情势而言，四个坚持有其必要。”

一九八四年和黄老见面后我留下了谈话内容的笔录，现于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初次公开发表。在黄老恳谈的内容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老一代的中国先进份子，如黄老其人，是拥有现代思想和深具爱国忧民的一番苦心。早年曾接受黄老领导的外交界工作者杨洁篪 (现国务委员) 在二〇一二年出版的《黄华画传》里引述了美中建交幕后功臣基辛格对黄华的称赞是：“黄华是中国杰出的外交官，不但很坚定，很有才华，而且很有人情味。”这一称赞是亲切笃实，恰到好处。在交谈时我陈述了自己对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看法和我从事美中民间交流活动的一些情况，他欣然听取了我的讲述。一九九〇年代，黄老在担任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会长期间曾几次举办控制烟害专家座谈会，我都受邀参加、发言及将专论纳入基金会的专辑发表。数年前我也曾去黄寓看望黄老夫人何瑾·良女士，见其身心健康，甚为宽慰。

正所谓：“身经百战办外交，万难不辞重担挑。浑身正气人情味，福寿双全是黄老。”

